

和母亲严凤英度过的时光

王小英

我们也慢慢步入老年,对眼前的事情多不是能够记得住了,倒是过去的时光渐渐清晰。和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也曾享受过短暂而温馨的母爱,也受到过严厉的责罚和棒喝。如果说我们和别的孩子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别人指指点点:他们是严凤英的儿子。

做严凤英的儿子得小心又小心:因为母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父亲王冠亚常笑道:别人家里是严父慈母,我们家里是倒过来的——严母慈父。你妈妈就姓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我们弟兄就开始了住校生活,一周只有一天能够回到父母的身边。每次周一要上学的时候,哥哥还好,说走就走,我使用一切手段耍赖拖延,大哭大闹地想多和母亲呆上几天。可是不行,母亲正在紧张忙碌的表演创作之中,一个又一个的新戏老戏正等着她去创作去演出,哪有时间管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时候她去省里开会,恰好又是周六,路过幼儿园时,会顺便接我一起回家。那是一段漫长的回家路,平时我走得累,舅妈会不时地背一背我,但是和母亲走在一起,再累也得自己走。她从不曾用背着或抱着的方式来惯着我。我也不敢过分撒娇,乐得和母亲边走边玩,拉着母亲的手看树看花看包河,听着妈妈讲着故事,沿着环城马路不知不觉就回到家里。

母亲一向起得很早,约莫早晨5点,她就会起床,到护城河边吊嗓子。尽管她已经有了名气,但是听剧团的小演员们说,多数时候,她会比小演员们更早到场。无论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吊完了嗓子,她又直接到小礼堂,和青年演员们一起练身段、跑圆场、练毯子功、练打出手。每当她大汗淋漓、喘着气回到家里换衣服的时候,我在床上才刚睁开眼睛。

一天,我突然听见妈妈小声问奶奶:“妈妈,您那里还有30块钱没有?这个月的工资不够了,借给我一点行不行?”奶奶一愣,说:“你每个月200多块钱还不够吗?”妈妈紧张地看看客厅里的客人和戏迷们,悄声地说:“这个月有几个老同事家里有困难,我把手里的工资拿给他们用了。这不,手里也没有存款,不够了。”奶奶苦笑道:“你那么高的工资都不够?我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么样搞啊。”妈妈亲切喊着奶奶:“妈妈!下个月我发了工资就还你,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借给我救个急好吗?”奶奶没好气地笑道:“说出去你严凤英和我借钱,谁相信呢?你还是要学着存点钱啊!”说罢,笑着转进自己的小屋,从木头箱子里翻出用手绢包着的一卷钱递给了妈妈。事实上,像这样借钱给同事救急的善举,妈妈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到了最后她没留下一点点积蓄。

要说我的妈妈会做手工活,恐怕



严凤英与丈夫、儿子在一起(图片由邢济霖提供)

没人会相信。她用彩色玻璃丝编织过小金鱼、游龙和青蛙等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精彩绝伦。家里经常会来一大帮青年女演员,她们会围着妈妈叽叽喳喳地交流编织技巧。一大捆一大捆的玻璃丝都是妈妈掏钱让小姐姐们去买回来的。最让我气恼的是,每次编好的一堆堆五彩缤纷的手工艺品,转脸就都不见了,据说都送了出去。

母亲经常会离开我们一段时间,听舅妈说她不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去外地开会了。有一次她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吃午饭的时候,神秘地和爸爸说道:“这回在北京,我和袁雪芬、王文娟她们一起去了总理的家里吃午饭了。”爸爸惊奇地问道:“你们就是去吃饭?也不帮帮大姐下个厨?”妈妈噘着嘴说:“当然要帮了,我们和邓大姐一起下厨房,每人做了一个拿手菜。”爸爸不以为然:“那有什么好神秘兮兮的?”妈妈有点严肃:“你个书呆子哎,做菜时,邓大姐背着客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总理这个月已经借了公家不少钱了。”爸爸很意外:“总理还要借钱?”“嘘!他经常招待客人,都是自己掏钱,很快就用完了。”说罢,妈妈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想不到一个国家的总理,工资都不够花……”爸爸听后也陷入了沉思。

这件事情促使妈妈更加慷慨地出手助贫。她以总理为楷模,不断地用自己的工资对团里团外贫困的老同事和老艺人们进行无私的帮助。

母亲尽管平日里对我十分喜爱,却从不会在金钱方面给我额外照顾。我用的书包和文具盒甚至穿的衣服都是哥哥用旧的。我抱怨铅笔太短了,刨刀不快了,书包磨出洞洞了,一般爸爸妈妈都不会给钱购买,他们会耐心地回答我说,铅笔不够长了,可以买一截笔套加长;刨刀不快了,可以卸下螺丝磨一磨;书包破了,请奶奶帮忙补一下。你还小,要学会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嘛……唯一的一次换笔,是我三年级时语文算术连考几次

100分,才得到了一支淡红色的,价值6角7分钱的金色钢笔。这是妈妈亲自带我去百货大楼给我挑选的。见到我对新钢笔千般珍惜的样子,妈妈在一边露出了开心和满意的笑容。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不懂事,经常会饿肚子没有饭吃。经常吃的只有红薯干、红薯粑粑、豆渣做的饭和混合的菜团子。妈妈她们有省里特批的照顾,以保证能够有体力正常演出。少数时候她会把自己的口粮带一些回来给我吃。当她看到我狼吞虎咽的吃相时,眼睛里常常会泛出泪光。

我在幼儿园住校的时候,奶奶说因为我被传染上了麻疹,校医简单地当作发烧处理,一针下去退了烧。我该发出来的麻疹被压了回去,所以我以后一直是过敏性体质,身体太不好。妈妈知道后,心里很难受,试图在其他方面对我做出情感方面的补偿。6、7岁时,我得了过敏性皮癣病,妈妈听了合肥医生的建议,带着我一起,趁着她去上海拍《牛郎织女》的机会,找到专科医院治疗。在治病的当儿,看见我的病情有了好转,妈妈又让朋友给我照了张相。她拿着我的糗样子到处和别人开玩笑。不过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幸运地见到了和妈妈失散多年又欣喜重逢的小姨。

我们哥儿俩自小很少接触金钱,对于钱没有什么概念。但父母的教育还是毫不放松,有件小事能够说明。

一天下午,我和哥哥去四牌楼新华书店买书,回来时居然在水电局门口的人行道上捡到一卷钱,大约有30多元。兄弟俩面对着手里的钱呆住了,这可以一笔巨款啊!我们站在原地左顾右盼地等了很久也不见失主找来。哥哥说,那我们把钱交给警察叔叔吧。旁边就是交通岗亭,我们一起把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后,如释重负地回了家。当我把这件事情骄傲地告诉舅妈后,舅妈高兴地转告了妈妈。妈妈却谨慎地反复向我了解捡钱交钱的全过程,又和哥哥做了核对

后,才非常开心地抚摸着我的头,又帮哥哥整了整胸前的红领巾。这时她的眼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意。

黑白电影《天仙配》上映后,黄梅戏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据说英国女皇十分喜欢,点名要把《天仙配》翻拍成彩色电影。那时的演员能够拍一部彩色电影的机会不多,多半是要争取出镜的机会。但是妈妈没有答应出演,反而主动要求把这个机会让给青年演员。自己在退出拍摄之后,又对青年演员毫无保留地给予热情辅导,传授表演技巧,亲手把他们送上了艺术表演的新天地。当然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有天晚上,我听着妈妈和爸爸低声聊起了此事。她说自己由于演出任务太重,身体又不是太好,此前不久经组织安排在上海动完手术,摘除了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常常感到十分疲劳,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为了报答党和国家给了她新生命的恩情,她决定抓住这个拍电影的机遇,大力推出青年演员,为黄梅戏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接班人,进一步推广、发展黄梅戏艺术。

“我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培养,也没办法做到现在这样的成绩。要知道现在和旧社会不一样了。旧社会演员没有保障,生老病死都要靠自己。现在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有剧团的依靠,有组织上的撑腰,完全衣食无忧了。我们还担心什么?”

她接着说:“我一个人再大的本事,也不能演到老了也不让台。那不成旧社会的戏霸了?所以,趁着自己还能演得动,尽量为国家多贡献。我是一个党员,更要带头赶早安排好年轻人接班,免得到时候耽误了大事。”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浮上心头,历历在目。母亲刻在我们心里的教诲始终不能淡忘。已经年逾六旬的我和哥哥还是保持着小时候养成的秉性,靠各自的专长过着自己平实的生活。在自食其力的同时,我们都在加倍小心地呵护着母亲高尚纯洁的名誉。不觉中,这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使命。在我们依然能呼吸的时候,这个使命一定还会始终继续下去。

(作者为严凤英次子)

